

中国农村金融 资源配置 研究

王永龙 / 著

ZHONGGUO NONGCUN JINRONG
ZIYUAN PEIZHI YANJ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金融 资源配置 研究

王永龙 / 著

ZHONGGUO NONGCUN JINRONG
ZIYUAN PEIZHI YANJ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研究/王永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04 - 6775 - 5

I. 中… II. 王… III. 农村金融 - 资源分配 - 研究 - 中国 IV. F83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0743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2

字 数 195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6)
三 本书研究的角度	(12)
四 本书的研究方法	(14)
五 本书的结构与主要内容	(18)
六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20)
 第一章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效应	(24)
第一节 金融资源的概念界定	(24)
第二节 金融资源的基本特征	(26)
一 金融资源脆弱性	(26)
二 金融资源配置性	(28)
第三节 金融资源配置	(29)
一 金融资源配置的界定	(30)
二 金融资源配置的分类结构	(30)
第四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的界定及其分类	(34)
一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的内涵界定	(35)
二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的微观分类	(37)
三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的宏观分类	(43)
第五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49)
一 农业金融乘数效应	(50)

二	农业生产函数效应	(52)
三	金融集约化效应	(54)
第二章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制度分析	(55)
第一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制度变迁分析	(55)
一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制度的内涵界定	(56)
二	转型期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描述	(57)
三	转型期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	(59)
四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金融抑制”分析	(60)
第二节	中国农村金融信贷配置及其特征	(68)
第三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制度供给分析	(71)
一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主体建构	(71)
二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原则	(72)
第四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制度供给模式	(75)
一	分级供给	(75)
二	分类供给	(76)
三	增量供给	(76)
第五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制度结构描述	(76)
一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政治制度	(76)
二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法律制度	(77)
三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行政制度	(79)
四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	(80)
第三章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分析	(86)
第一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机制	(86)
一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界定	(87)
二	计划配置机制	(89)
三	市场配置机制	(90)
四	政府干预机制	(91)

五	分融配置机制	(92)
六	分类配置机制	(93)
七	农户小额信贷机制	(97)
八	专项收购信贷机制	(98)
九	产融结合机制	(101)
第二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选择	(104)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配置机制选择	(104)
二	商业性金融配置机制选择	(105)
三	政策性金融配置机制选择	(105)
四	合作金融配置机制选择	(106)
五	中央银行的配置机制及其作用	(108)
第三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基于三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108)
一	四川省渠县国粮个案：市场性与政策性均衡	(108)
二	河南省新乡市农发行个案：政策性金融 配置转型	(113)
三	农户小额信贷的配置效应分析	
	——湖北省随州市府河镇农户小额信贷个案	(117)
第四章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缺陷分析	(123)
第一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遭遇主体缺失	(123)
一	国有商业性银行从农村地区的大规模撤出	(123)
二	农村金融风险转移机制面临主体缺位	(124)
三	农业资本市场主体缺失	(125)
四	非正规金融没有合法地位	(125)
第二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面临功能缺陷	(126)
一	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程度较低陷入金融抑制	(127)
二	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机制	(129)
三	政策性金融陷入定位偏差	(129)

四	“金融城市化偏好”导致城乡金融分治	(130)
第三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面临逆向约束	(132)
第四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缺陷的制度解析	(142)
一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抑制性因素	(142)
二	不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142)
三	合作产权变异	(143)
四	金融机构布局不合理	(143)
五	持续制度变迁惰性	(144)
第五章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分析	(146)
第一节	金融资源的帕累托配置及其解析	(146)
一	帕累托配置及其三个边际条件	(146)
二	金融资源的帕累托配置及其解析	(148)
三	金融资源帕累托配置的边际条件	(151)
四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外部性约束	(153)
第二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内涵与原则	(156)
一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内涵界定	(156)
二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基本原则	(157)
第三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系统分析	(165)
一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优化分析	(165)
二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分析	(168)
第四节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空间优化分析	(170)
一	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170)
二	农村存贷款结构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173)
第五节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路径优化分析	(176)
一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路径的积弊分析	(176)
二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创新路径	(178)
第六章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对策分析	(182)

第一节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基本思路	
主要内容	(182)
一 农村金融资源优化的基本思路及其内涵解析	(183)
二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主要内容	(184)
第二节 农村金融体系的优化对策	(186)
一 改革和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	(186)
二 发挥商业性金融在农业金融体系中的 主体作用	(195)
三 坚持合作性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 基础性地位	(200)
四 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205)
第三节 农村金融运行环境的优化对策	(210)
一 为农村金融体系规范运行建立良好的 制度环境	(210)
二 为农村金融运行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13)
三 为农村金融体系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216)
主要参考文献	(220)

导 论

一 研究背景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当前,这一问题已经演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影响社会的进步,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自 2004 年以来,中央连续三个“一号文件”均是关于“三农”问题,其中,2004 年提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对策,明确提出了增产增收减负的指导方针;2005 年提出了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的指导方针;2006 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民的富足、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和推动。实际上,“三农”问题的日益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支持严重不足。

我国转型发展以来的金融改革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1978—1983 年的启动改革阶段;1984—1993 年的巩固改革阶段;1994 年以来的深化改革阶段。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持续改革,我国金融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制度性变迁,金融经济功能显著增强。但是,由于特殊的转型背景和初始条件的约束,在我国金融改

革的进程中，一方面，国家始终保持着对整体金融经济广泛而深刻的管制。这使得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表现出“不完全一致性”。另一方面，国家实行一种被称为“城乡金融分治”^①的战略，这使得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化进程与城市经济市场化进程又表现出“不完全一致性”，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化进程不仅滞后于城市金融市场化进程，也滞后于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因此，改革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发展，但这一改革进程的“溢出效应”仍然十分有限。因此，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仍面临诸多问题的约束。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出复杂性，而且表现出多样性。根据这些问题的表现形态，本书将其划分为如下四种基本类型：

(1) 金融机构问题。最近 20 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显著发展，但与全国整体金融发展程度相比，农村金融仍处于某种被抑制的状态。目前，中国金融发展的二元性并未得到有效缓解。一方面，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或称为“非正式金融”）并存，而正规金融由于组织体系和组织结构的约束，具有显著的“城市化偏好”，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提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存在明显的“定位不清”和“职能缺位”，对面向农村经济投资产生一定程度的“惜贷”。“非正规金融”由于缺乏有效制度规制和政策引导，造成严重的无序和违规运行，给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布局不合理。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区域布局和城乡布局双重失衡，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分布密度较小，信贷机构的人口覆盖率和企业覆盖率小，这势必造成农村地区和农村经济领域金融资源供给的严重短缺。同时，农村各类金融机构自身存在日益严重的运营问题。例如，资产质量问题、信贷结构问题、

^① 林毅夫：《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2003026。

信贷规模问题、信用问题、治理问题等，这些问题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运营效率下降，并成为农村金融机构职能缺位的根源。

(2) 金融市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金融市场化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城市金融市场化采取的是一种渐进自由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管理权限逐步扩大、金融市场准入逐渐放松、金融机构逐渐多元化、利率市场化等。农村金融市场化发展则走出了由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不断突变的轨迹，政府通过不断地调整它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来持续加强对农村金融资源动员、配置与市场运作的“强干预”。1979年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虽然逐渐形成，但与基本完善的城市金融市场体系相比，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严重不完善，存在着“市场区割”、“局部市场寡占”、“不完全充分竞争”、“监管失效”等缺陷，致使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或被实际扭曲，市场效率难以迅速提升。农村金融资源供求失衡、占用率低且面临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农村资金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则是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因此，农村经济对信贷资金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趋势与农村资金外流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再一方面就是农村金融资源占用率低。我国的金融资源分布结构不合理，65%以上的金融资源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央行分行所管辖的地区，而占国土面积50%以上的广大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所占比例仅为18%。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扭曲，国有经济占用了75%以上的金融资源使用权，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达到5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和农村经济仅占用不到25%的金融资源。

(3) 金融政策问题。政策的意义在于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实际上，由于我国农村金融面临显著的初始条件约束，更需要政策的明确导向。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安排，显然存在某些不合理性。例如，对于商业性金融基层机构设置与信贷权限的政策性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我国目前国有

商业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只设置到县级行政，这些县级支行尽管在机构管理上实行“一级法人制”，但在业务管理上则是上级支行或分行授权经营。县级支行的“金融事权”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县级支行只有资金组织权、贷款调查（贴现审查）权、收贷权，对大额资金信贷没有审批权和授信权。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规定必将限制商业性金融基层机构面向农村经济的信贷规模和对信贷投资项目的自主选择。实际上，诸如此类的政策性规定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中也大量存在。显而易见的是，正是这些不合理的政策规定，成为农村金融机构陷入功能弱化和治理缺损的重要根源。

（4）金融制度问题。金融制度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先导。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金融改革，实际上是在追求和致力于建立一个“市场化金融体系”，它是通过建立各种成分不同、组织形式不同、职能不同的多元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原有金融体系的外延扩大再生产。通过设立新兴金融机构，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一统”金融体系格局已被打破，金融机构在数量和多样化方面发展迅速。如果从广义货币量 M2 与 GDP 的比例（金融深度）来看，中国的这一指标已超过澳大利亚，并与日本基本达到同一水平，表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明显加深^①。但是，金融部门的这种量的扩张，并未带来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的深刻变化，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尚待深入。虽然因为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种类增加了，但其机构总量却减少了，综合性服务功能也实际上降低了。更重要的是，由于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严重产权不明晰，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也将更为突出。麦金龙和肖认为，如果金融市场化改革不能完成，即使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先行，也必将被滞后的金融改革所拖累。由此可见，经济改革尽管给中国农村金融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① 周伟贤：《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但却并未带来更“深刻的”变换。

上述农村金融问题在实践中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从金融资源论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可以一并归结为金融资源配置问题。金融既是被配置的资源，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制度资源，这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性。具体来说，作为一个整体，金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要素和源泉，从而体现了金融的资源属性；同时，金融又是经济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制度。现代经济中，金融内生于经济，经济日益金融化，金融与经济相融，金融成为经济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越来越明显，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使得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逐步处于核心地位。

这些复杂性和多样性表明：尽管中国农村金融在机构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与创新，但涉及农村金融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切实的、彻底有效的解决，由此导致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率，必然形成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基础脆弱性，即所谓的“金融弱质”，同时也表明：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金融经济活动，而是一个涉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组织、金融制度与金融政策安排等多个方面的复杂性金融行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问题成为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症结。

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由于农村金融在农村和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解决农村金融配置问题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中的关键。因此，分析和研究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及其优化问题，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传统金融发展理论^①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所面临的紧迫性问题是严重的资本形成不足而导致的金融资源总量短缺和结构失衡。由于金融体制的脆弱性以及金融体系的不完善,社会的金融资源动员与配置效率都相对较低,这些使得经济社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必然在相当程度上难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因此,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将研究重点集中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金融模式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了“供给型金融”和“需求型金融”,并阐述了两类金融模式的配置特征与体制路径。

金融结构理论阐述了金融结构变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金融结构变化的源泉在于特定条件下的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体制建构,即特定时期内国家的金融运行及其效率实现。

金融深化理论则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并深刻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

然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尽管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经济增长的金融路径选择,但却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源配置及其效率与配置优化问题的分析。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是:金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能够影响实际经济行为和经济增长。近20多年来众多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该观点。King & Levine (1992)、Boot & Ttakor (1996)、Beranke (1998)等人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机制。

^① 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代表性理论包括:金融模式理论(休·帕特里克,1966);金融结构理论(戈德史密斯,1969);金融深化理论(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1973)等。

他们提供的各类模型分析表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于长期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资本积聚以及生产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 Pagan (1998) 则利用 AK 模型归纳了这些机制的基本路径。他指出，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储蓄资源转化为投资资源的比率，提高资本的社会边际生产率，并影响私人储蓄率。最近的研究显示，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够降低总体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例如，艾斯特内尔 (Easterly, 1993)、阿斯莱姆 (Islam, 1998) 和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2001) 等人的研究发现，金融运行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水平在 60 个国家是产出增长波动回归中最强有力的显著性解释变量。在他们的回归模型中，信贷总量增加 1 倍（从占 GDP 的 20% 增加到 30%）将使年度经济增长的标准差从 4% 下降到 3%。有效金融资源配置显示了对于屏蔽某些特定经济波动性冲击的强大能力。另一些金融学家如拜克 (Beck, 1992)、拉萨尔 (Loavza, 1993)、莱恩 (Levine, 1996) 等人，证明了微观金融配置优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资本存量；昆特 (Kunt, 2000) 和马克斯姆克 (Maksimovic, 2000) 等通过对 30 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通过内源融资拉动的长期增长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发现，有效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能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外源融资的深度与广度。因此，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增长的战略性选择。

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金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可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研究。金融抑制 (Shaw, 1973; McKinnon, 1973) 是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状况时被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理论上讲，中国农村金融抑制既可能是供给型的，即正规金融部门金融信贷或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也可能是需求型的，即农户对金融信贷或金融服务需求相对不足。叶兴庆 (1998)、乔海疆 (2001)、谢平 (2001) 等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抑

制属于供给型金融抑制，导致中国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金融结构”下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信贷投资的供给不足。按照谢平等人的观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农村金融中应发挥作用但却没有发挥。王坚（2004）、高帆（2002）、曹立群（2000）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基本特征是供给型抑制与需求型抑制共存。马晓河、蓝海涛（2003）、何志雄（2003）等人则提出，中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仅是一种从属现象，处于次要状态。

（2）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运营导向问题的研究。金融体系是金融市场机制的制度基础。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建立以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为主体、兼容其他各种类型金融的多元化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组织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对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商业化取向，则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争论。这些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的论点：第一，主张以合作金融为主导（程漱兰，1997）；第二，主张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温铁军，2004；谢平，2001；党国英，2004；文贯中，2004）；第三，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冯兴元，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2；陆磊，2003）。

从理论本源来说，各种观点的差异关键在于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的理解。如果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如果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则是恰当的。但无论是从“理性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

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过于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值得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别，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命题是普适的。故农村金融安排绝不能“一刀切”，到底选择哪一种模式应尊重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选择。可以认为，只有具有内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最有生命力，也才能充分实现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职能。

(3)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缺陷问题的研究。就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深度（M2/GDP）等金融发展指标均显示了一定的增高趋势，但我国的金融体制仍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张杰，1996）。尽管这一结构具有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制度背景，但其整体运行却显然陷入某种“低效率均衡”。我国农业和农村金融尽管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三融并举”，但它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某种有效的“激励兼容”，一个突出的表现被称为金融“城市化偏好”和“农业歧视”。这一机制引致我国农业和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抑制性”和“逆向性”，并导致我国农业和农村地区陷入“恶性的金融贫困陷阱”（王永龙，2004）。由于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导致农村地区成为现阶段我国高度金融资源稀缺的经济区域。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实行追赶型发展战略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体制服务于战略”的制度安排，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的实现，国家就必须运用集权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统一配置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全部经济资源。同时为了保证“体制服务于战略”的实现，国家不得不依靠农业和农村地区为其提供资本积累并创造资本剩余（林毅夫等，1994），由此，农村金融机构成为国家动员农业剩余为城市工业化供给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林毅夫等，2000）。在渐进改革的转型期，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并保障国家经济改革的稳定性，将金融资源配置偏向于城市国有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张兴盛，2002）。